

“萨德”入韩以后中韩经贸合作与政治互信 不同步改善现象的分析

潘彬彬*

【目 录】

1. 前言
2. “萨德”入韩后中韩的政经关系
3. “萨德”入韩后中韩经贸合作迅速恢复的原因
4. “萨德”入韩后中韩政治互信改善缓慢的原因
5. 经贸发展为何不能有效拉动政治互信的改善
6. 如何改善中韩政经关系不同步发展的现象

【摘要】

中韩的经贸合作与政治互信受到“萨德”入韩的影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此后,中韩经贸合作和政治互信都得到了修复。然而比起经贸关系的快速修复,政治互信的改善却进展缓慢。中韩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分属不同的领域,彼此相互独立,有着各自的运作逻辑与规律。具体来说,中韩经济关系由市场主体主导,而政治关系则由政治主体主导,市场主体与政治主体行为偏好上的差异形成了中韩政经关系不同步改善的现象。“萨德”后,受到泛政治化的影响,快速修复的经贸关系却始终未能有效拉动中韩政治关系的改善。然而,当前中韩政经关系存在的问题依然可以改善。首先,针对官方交流存在的泛政治化倾向,可以通过去政治化实现官方交流的理性回归;其次通过活跃民间交流可以遏制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改善民间的对立情绪,从而重构中韩关系的民意基础。

【关键词】“萨德”入韩; 经贸合作; 政治互信; 官方交流; 民间交流。

* 潘彬彬, 亚洲大学政治外交系博士结业生 (changing0591@vip.qq.com)。

1. 前言

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分属于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层次，两者的割裂也较为常见。在中韩关系中，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也存在着相互独立的特征。中韩政治关系属于官方行为，围绕着两国的政治主体展开；而中韩经济关系属于市场行为，主要围绕着市场主体展开。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具备各自的运作规律，彼此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性。在朴槿惠时期中韩政经关系大体呈现出同步发展的格局，双边不仅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还积极开展了政治合作深化了双边的政治互信，政治合作和经贸合作彼此形成了一定的增益效果。

2016年1月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韩国积极开始引入“萨德”反导系统。“萨德”的部署使得中韩两国陷入安保困境。政治主体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偏好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中韩关系。此后中韩关系大幅恶化，朴槿惠时期中韩双边政治交往和经贸合作的良性发展格局也被打破。在经贸合作领域，2016年中韩贸易总额同比下降了8.5%，2017年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也同比下降了22.3%。在政治交往领域，中韩关系分值¹⁾也大幅下降，从2015年的高点6.38下降到2017年的3.71。文在寅总统执政后，两国就“萨德”问题积极开展协商，经贸合作亦或是政治互信都实现了修复与改善。然而经贸合作的恢复与政治互信的改善并非同步，经贸合作得到了快速的修复的同时，双边政治互信的改善却异常有限，形成了“萨德”后中韩政经关系不均衡发展的现象。

中韩关系步入曲折后，中韩两国学界对中韩关系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安全问题泛化到经济、人文领域，学界普遍认为中韩关系出现了新的挑战（沈铭辉等，2017）（赵立新，2020）（毕颖达，2017）（李宗勋，2018）。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韩两国属于“两国、两制、两个安全体系”，因此在政治层面存在结构性的分歧，并且这样的分歧是必然的、不可协调的（이장원，2017）（왕샤오커，2017）（张茜喆等，2017）（王箫轲，2018）（陈向阳，2022）。萨德入韩则触发了这一矛盾，使得安保问题成为了制约中韩关系良性发展的短板（姜龙范，2022）。由于政治安保问题愈发不可调和，因此近几年学界对中韩关系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

首先，针对政治关系面临的挑战，中韩两国学界在探讨其原因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给出了不一样的解答。中国学界更倾向于将制约中韩关系的主要原因归结于韩国政府（毕颖达等，2022）。相反，韩国学界则认为中国政府是主要原因。比如，中国在与韩国的安

1)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包含1980~2020年中国与韩国的双边关系分值数据，构建方法是根据『人民日报』和中国外交部网站的信息。对事件进行赋值，再将事件分值转化为双边关系分值。当数值为正时代表净合作，当数值为负时则表示净冲突或对抗。

全合作方面不够积极（박휘락，2020）、中国侵占了韩国的历史和文化（황재호，2020）、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教育不断加剧中韩关系的紧张（김한권，2022）。可见当前的研究依据国籍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主张与立场。

其次，针对中韩关系面临的问题，学界给出了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主要集中于政治层面，认为中韩两国应该正视意识形态、制度和安全方面的分歧，并且讨论如何尊重、协调或克服这些分歧（최재덕，2021）（이기현，2022）。此外，还包括两国应该共同合作推进地缘政治问题的解决，突出政治的引领作用，精心呵护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等（门洪华等，2017）（白永瑞，2018）（김진호，2018）（王俊生，2019）（이남주，2021）（신중호，2022）（李冰，2022）（李春福，2022）（신중호，2022）。也一部分研究认为要加强中韩在经贸领域的合作（최재덕，2021）（刘晓宁等，2022）（张爽，2022）（梁亚滨，2022）（정중호，2022）。

总体来说，针对释疑研究当前的研究普遍集中于单一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特别从政治经济关系互动的角度分析依然比较不足。政策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官方交流层面，缺乏对民间交流层面的研究。结合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拟结合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从政治主体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偏好角度出发，分析“萨德”入韩后中韩政治经济关系非同步改善的原因。最后，结合政治主体与市场主体各自的行为特征，探讨后在疫情时代中韩政经关系如何回归平衡。

2. “萨德”入韩后中韩政经关系

1) “萨德”入韩后中韩经贸合作的恢复

“萨德”入韩后，中国的经济反制措施对中韩经贸领域产生了短暂的负面影响，然而双边经济关系并没有因此陷入“经冷”。在摆脱政治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后，中韩的经贸合作得以快速恢复并且成绩斐然。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2021年中韩货物贸易额为3624亿美元，双边贸易额创出了新高，相比“萨德”入韩前的2015年同比增长了31.4%。从2016年到2020年，韩国对中国的累计投资额达到218亿美元，中国对韩国的累计投资额则达到了35亿美元，韩国对中国的投资额在2021也创出了新高。2017年两国宣布启动中韩自贸区第二阶段的谈判，至今已进行九轮。在金融领域，2017年10月两国续签本币互换协议，协议延长3年，规模为3600亿元人民币。²⁾此外，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两国开通了商务往来

2) “中韩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展期”，『新华网』，2020.10.22.，<http://www.xinhuanet.com/world/>

的快捷通道，两国通过商务往来的快捷通道等方式，有效稳定了全球供应链，使双边的经贸合作得以顺利有序进行。³⁾可见“萨德”入韩以后双边经贸合作不仅实现了快速的修复，还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图1> 2015-2021年中韩贸易规模

(单位: 1000美元)



*来源：历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2) “萨德”入韩后双边政治互信的缓慢改善

相比较经贸合作的快速恢复，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却进展缓慢。从中韩关系值走向可以看出，2017年以后双边政治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图2），但是却远远未能恢复到2015年的水平，截至2020年中韩关系值仅仅恢复到2015年水平的64.2%，这与经贸合作的快速恢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外，通过双边的高层外交的动向也可以看出中韩政治关系改善的迟缓。作为官方性质的政治交往，高层交往通常是双边关系发展水平最本质的体现，⁴⁾因此两国间高频率的互访是两国关系友好的象征，反之则往往说明两国关系出现了问题。“萨德”入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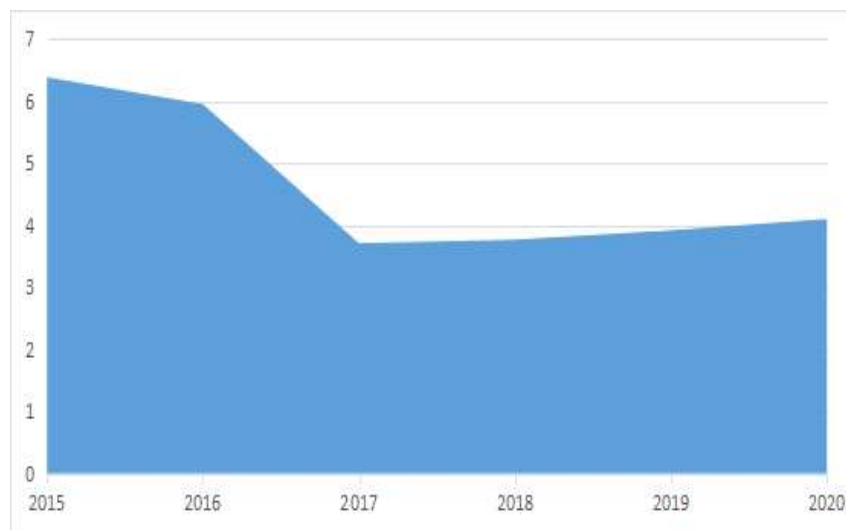
2020-10/22/c_1126644210.htm [2022. 07. 22.]

3) “中韩经贸合作“深”级潜力大”，『中国商务新闻网』，2022. 06. 08.，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rcep/rcepgfgd/202206/48719_1.html [2022. 07. 22.]

4) 张清敏、刘兵，「首脑出访与中国外交」，『国际政治研究』，第2辑，2008，pp. 1-20.

后，中韩高层外交的频次也出现了下降。在朴槿惠时期中韩间的高层互访的年平均次数为3.3次，“萨德”入韩后双边高层互访的年平均次数降到2.8次。元首外交的频率更是大幅减少，在朴槿惠时期中韩元首进行了多达8次的首脑会谈，“萨德”入韩后，双边元首外交次数下降到了2次。“萨德”入韩后中韩双边高层外交频次减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受韩国国内政治和新冠疫情的影响，然而双边政治互信改善的缓慢则是主要原因。

<图2> 2015-2020年中韩关系值走向



*来源：清华大学中韩和大国关系数据库 <<http://www.tuiir.tsinghua.edu.cn/kycg/zwgxsj.htm>>

3. “萨德”入韩后中韩经贸合作迅速恢复的原因

“萨德”入韩后中，中韩经贸合作之所以可以快速恢复得益于市场主体的理性。与政治主体追求政治利益不同，市场主体具有盈利属性，他们的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市场主体的这一特征决定了他们往往不会盲目跟随政治方向，也不以双边政治关系的好坏作为市场行为的主要依据，他们更加重视包括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以及价值规律等在内的市场规律。因此现实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政治主体视为威胁的对象，市场主体却可视为机遇。“萨德”入韩后，虽然中韩政治关系陷入紧张，但是这并不妨碍两国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行为实现经济价值的目标，因此中韩的经贸合作得以超脱于政治关系的束缚，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有序平稳地开展。可以说“萨德”入韩后，理性的市场主体展现了自身的活力，有效对冲了中韩关系中的政治色彩，成为了稳定中韩关系的重要组成要素。接下来我们以在华韩企以及中国代购商的行为理性为例，解析“萨德”入韩后中韩经贸合作快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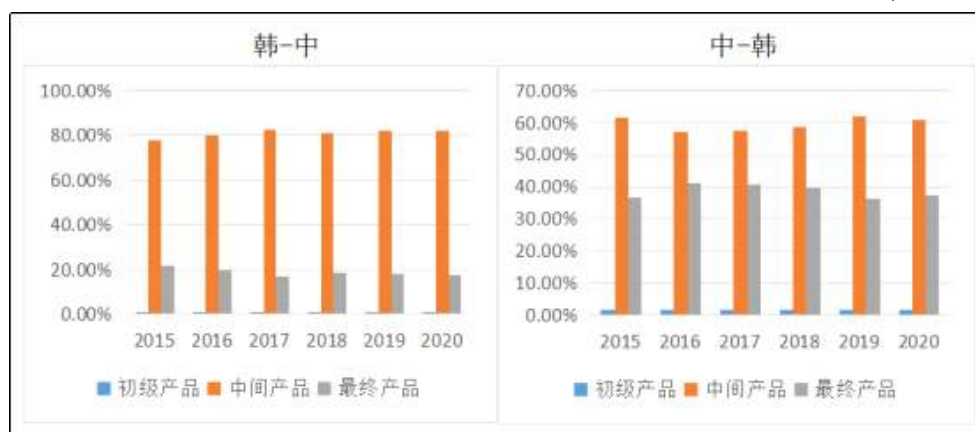
恢复的原因。

1) 在华韩企的理性

在全球GPN分工模式下，跨国企业为了实现盈利的最大化往往将比较优势作为产业链空间布局的主要依据。中韩建交以来，韩国的跨国企业便基于这一市场规律，在中国进行产业布局。在经过长期的市场实践，两国最终形成了成熟稳定的中韩产业分工。“萨德”入韩以后，文在寅政府为了避免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制定了经济多元化政策，鼓励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东盟等国家。尹锡悦政府也延续了文在寅政府的基本方针，力求降低在全球供应链上韩国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与美国在供应链领域的合作。然而从近几年中韩进出口贸易的结构来看，中韩贸易的结构并没有因为韩国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而发生本质的变化。从近几年中韩贸易结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萨德”入韩后中韩进出口贸易中的中间品比重始终维持在50%以上（图3），以中间品主导的贸易结构并未因政策导向而出现下降的趋势。这充分说明了“萨德”入韩以后，韩国企业依旧维持着在中国的产业布局，中韩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供应链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图3> 2015-2020年中韩贸易结构

(单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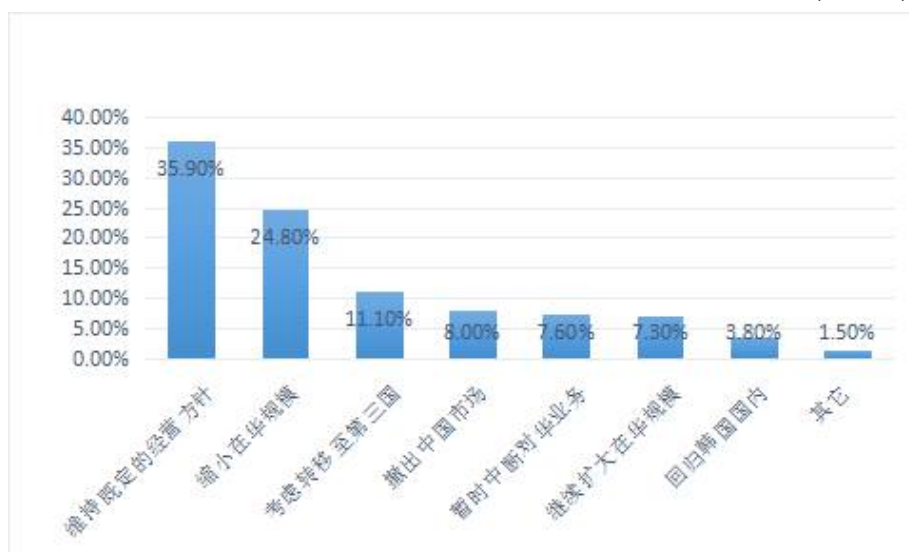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s://comtrade.un.org/>>

2019年底全球遭遇新冠大流行，疫情对中-韩供应链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许多韩国企业也感受到了来自供应链的压力。然而面对供应链的风险，韩国企业依然展现出了相对理性的一面。根据韩国贸易协会（KITA）2022年6月提供的一份的市场报告（图4），面对中国政府的防疫政策带来的经营风险，仍然有35.9%的韩资企业选择维持既定的经营

战略，甚至有7.3%的企业表示将扩大在中国的经营活动，而选择撤回韩国的企业仅占3.8%。可见，政策因素虽然对韩资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是始终没有成为韩资企业是否继续在华经营的决定性因素，韩资企业的去留更多从经营成本、供求关系等市场层面进行判断。中国全产业链的制造规模、庞大的内需市场规模和惊人的购买力，这些是全球其他国家是难以复制的，韩国企业也难以找到其他国家替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盲目跟随政治理念和政策导向中断中韩产业链，将产业链转移至基础设置落后、市场发育水平低的国家，对于韩国企业而言成本过于高昂，也不符合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正是韩资企业的理性使得中韩产业链在面对政治风险时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也为政治冲突后中韩经贸合作的恢复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图4>中国防疫政策与韩国企业的应对

(单位: %)



*来源: KITA Market Report, 「중국 코로나-19 방역정책 관련 주중 한국기업 경영환경 조사」, 2022, p.11.

3) 中国代购商的理性

市场主体的理性不仅体现在在华经营的韩资企业，中国赴韩的代购商也是市场主体理性的主要践行者。代购商作为市场主体的一员，实现个人利益同样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因此即便受到爱国主义与政治正确的绑架，代购商则依旧展现出市场主体理性的一面。“萨德”入韩后，中国政府采取“反萨”措施，赴韩中国团体游客大幅减少，然而中国代购商却没有因为中韩关系转冷而停止他们的商业活动。据韩国统计的数据（表1），2017年4季

度以观光为目的入境韩国的中国人, 较1季度骤减了约40%, 但同期韩国免税店外国人销售额却较1季度增长了约8%。代购商不仅成功取代了团体游客, 甚至还推动了韩国免税店销售额的不断增长。

<表1> 赴韩中国观光客人数及免税店销售额 (2017-2018年)

(单位: 人次, 亿韩元)

	'17 1Q	'17 2Q	'17 3Q	'17 4Q	'18 1Q	'18 2Q	'18 3Q
以观光为目的入境韩国的中国人	1,211,996	512,818	662,424	729,267	754,920	817,255	1,352,734
免税店销售额	5,715	4,051	5,620	6,100	6,047	6,704	6,880

*来源: 韩国文化观光部观光知识信息系统 <<https://know.tour.go.kr/>>;

韩国统计厅化妆品海外直接销售额 <<https://kostat.go.kr/portal/korea/index.action>>

中国代购商们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 其商业活动对“萨德”后中韩关系的修复也有着实际性的增益效果。首先, 代购商的经营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成功代替了旅游产业, 有效对冲了政治冲突的对韩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使得“萨德”制裁无力化。⁵⁾在中国代购商的带动下不仅韩国免税业免于遭受巨大的打击,⁶⁾同时还带动了众多韩国中小商家销售额的增长。⁷⁾随着代购利益链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新的经济性利益团体 (Economic Interest group) 逐步形成, 这些利益团体重视中韩关系, 并期待中韩关系的改善, 他们具备一定的舆论力量, 不断引导政治行为回归理性。

其次, “萨德”后“限韩令”对中韩文化交流带来在诸多障碍, 中国代购商们则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代购商通过自媒体与直播带货的形式间接促成了中韩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民众可以通过代购商便捷的接触和了解韩国的文化, 另一方面代购商与韩国民众的交流也增加了韩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文化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修复了两国的民间情感, 缓和了民众间的对立情绪, 遏制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过度抬头。然而新冠疫情后, 代购商的活动受阻, 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两国的民间交流, 加深了两国的文化隔阂, 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

5) “중국인 보따리상 '다이궁' 파워”, 『조선일보』, 2017.08.25., https://biz.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7/08/24/2017082403053.html#csidxb26434be106b7a09f7e65d1343ba108 [2022.08.15.]

6) “代购填补中国游客空缺 韩免税店业绩不减反增”, 『中央日报』, 2017.05.22., <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82719> [2022.08.15.]

7) “중국 ‘보따리상 BJ’ 600팀 생중계에……동대문이 살아난다”, 『조선일보』, 2019.01.08., https://www.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9/01/08/2019010800166.html [2022.07.22.]

4. “萨德”入韩后中韩政治互信改善缓慢的原因

相比经贸合作的快速修复,中韩政治互信的改善却极其有限,原因是政治主体与市场主体各自在利益偏好上的差异造成的。与市场主体理性追求经济利益不同,政治主体追求的则是政治利益,这严重限制了中韩政治互信得以改善的空间。首先,面对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安保问题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考量,因此理性的政治决策者更加关注的是国家的生存利益而非发展利益。当国家的安全利益面临挑战时,发展利益必然要让位于生存利益。⁸⁾其次,政治主体追求的是权利的获得(当选)以及实现(维护统治),因此政治主体往往需要迎合民意以实现权利的合法性。“萨德”入韩在两国掀起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浪潮,这严重损害了中韩关系的民意基础,从而阻碍了政治互信的改善。

1) 政治主体对国安利益的理性追求

在国际社会中,由于不存在权威式的“世界政府”,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anarchy)。在无政府状态下,政治主体的首要关注点是权力和安全。因此政治主体的行为理性体现在通过积累权力以确保国家的生存利益。基于这样的认识,政治主体理性地将国际关系划分为高层级范畴和低层级范畴。其中国家安保属于高层级范畴,经贸交往则属于低层级领域。在两者之间政治主体更加偏好国家安保,并将其凌驾于资本逻辑之上。⁹⁾就中韩关系而言,实现国家的安全利益同样是两国政府的首要国家利益诉求。回顾中韩建交以来的交往史,我们也常常可以发现两国政府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理性追求往往是中韩政治关系大幅波动的主因。

首先,面对朝核问题对国家安全构成的直接威胁,韩国政府理性地认为“萨德”部署能对朝鲜起到震慑作用,是实现韩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因此,韩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执意配合美国部署“萨德”(即便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后,即便南北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但是出于安保考量韩国政府也始终没有让美国撤走“萨德”,这使得中韩的政治互疑趋于长期化。在对美外交方面,维护韩美同盟始终是韩国政府的重要课题。在特朗普时期围绕驻韩美军军费开支等问题韩美军事同盟关系曾一度紧张,但是文在寅政府出于国家安保的考虑,并没有借此弱化韩美同盟。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文在寅总统便主动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巩固韩美同盟关系。在对华外交方面,受限于安保困境,

8) 李少军,「正确处理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瞭望新闻周刊』,第14辑,2005, p. 1。

9) 黄河、周晓,「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9辑,2022. 01, pp. 107-120。

文在寅政府统采取了对华模糊性战略。¹⁰⁾然而模糊性战略在韩美同盟的结构性安全框架内运作,本质上是“先美后中”,并非中美等距离战略,存在对华政策制衡的色彩。¹¹⁾因此“萨德”入韩后,韩国政府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理性诉求实质上限制了其与合作中国的合作空间,中韩政治互信的改善空间也受到限制。

同样,受“萨德”入韩影响,中国政府也陷入了安保困境。由于“萨德”入韩是美国压制中国的战略布局之一,¹²⁾因此中国政府理性地认为“萨德”部署侵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安全利益)。¹³⁾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中国政府毅然决然对韩采取了反制措施,从而政治议题扩散至经贸合作及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此后,中国政府始终将“萨德”视为底线问题,¹⁴⁾对韩外交政策也从偏好经贸合作转变为排除美国军事威胁为主的安保强硬政策。¹⁵⁾同时,针对安保问题中国政府坚持战略定力思维,¹⁶⁾强调意志上的坚定执行,因此基于“萨德”未撤离韩国的客观事实,中国政府坚持向韩方表达对核心利益的关切,不断敦促韩国政府继续妥善处理好敏感问题。¹⁷⁾由此可见,中国对安全利益的理性追求以及表现出的战略定力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韩政治互信的改善空间。

2) 民族主义的泛政治化

中韩两国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自建交以来便一直存在,主要来源于两国间的领土问题、历史文化问题 and 价值观念差异问题等。“萨德”入韩后,国安议题显著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断与爱国主义捆绑,进而形成了狭隘的政治观,滋生了民族主义的泛政治化倾向。一般情况下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制定需要一定的民意基础,虽然还未有研究

10) 金永皓、田德荣,「文在寅政府外交的“模糊性战略”: 动因、内涵及影响因素」,『当代韩国』,2021.02, pp. 21-32。

11) 王箫轲,「文在寅政府的“两轴外交”评析」,『当代韩国』,2019.01, pp. 15-23。

12) 刘利乐,「论“萨德入韩”的非正义性及其矫正」,『城市学刊』,第41辑,2020.02, pp. 96-101。

13) “韩国引入“萨德”严重破坏中韩互信合作”,『新华社』,2016.08.02.,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802/c1002-28604064.html> [2022.08.20.]

14) “李开盛: 部署“萨德”, 将损中韩关系底线”,『环球网』,2015.02.09.,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JHBKk> [2022.08.20.]

15) PAN BINBIN, 「The Value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iplomatic Rhetoric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 An Example of Chinese Diplomatic Rhetoric Toward South Korea」,『아시아연구』,2022.25(4), pp. 229-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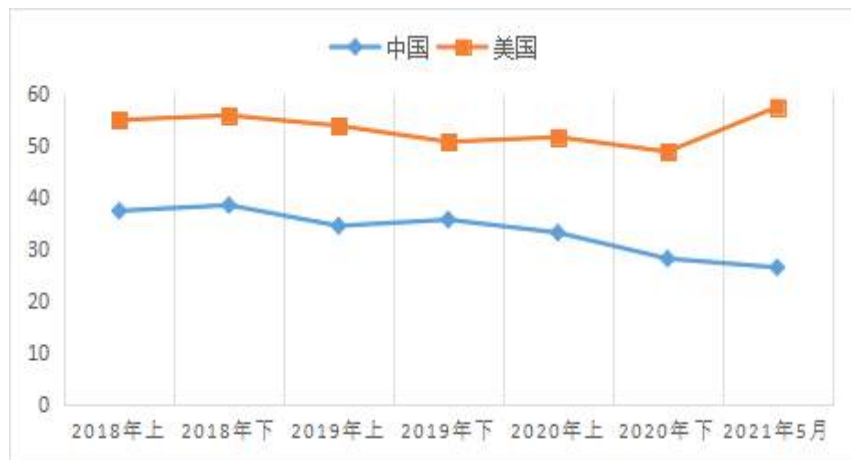
16) 战略定力最早由习近平主席提出,指领导者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和素养,一种工作和思维方法;即领导者要有长远战略眼光,处乱不惊,沉得住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朝令夕改。战略定力诞生后便成为习近平政府的战略文化之一,成为了习近平主席坚守核心利益信念的处事原则。在对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战略定力则包含着“底线思维”。

17)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人民网』,2018.11.18.,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406667> [2022.08.20.]

表明韩国国内的反华情绪与韩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存在关联性，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制约韩国政府在改善中韩关系上的作为，成为了韩国政府的外交负担。¹⁸⁾ 比如，2017年文在寅总统出于改善中韩关系的目的，曾称赞“中国是高山般的大国”，随即民族主义者便攻击其为对华外交的低姿态。¹⁹⁾ 此后，随着韩国民众对中国的情感温度不断下降（图3），民族主义情绪还扩散到了2022年的韩国大选中。在大选中，众多政党的总统参选人屈从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纷纷批评中国，展示强硬的对华态度，通过迎合民族主义情绪，提高年轻选民的支持度。²⁰⁾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绪也日益扩大，嫌韩情绪日益兴起。虽然中国国内的政治体制采用间接选举为主，但中国国内仍存在着公众舆论。当反韩情绪成为舆论主流时，势必也会给中国对韩国外交带来压力。总而言之，“萨德”入韩后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并不断扩散至政治领域，对两国政治互信的改善形成了一定的阻力。

<图5> 中2018~2021年韩国对中美两国的情感温度走势

(单位: %)



*来源: 표나리, 「반중 정서를 어떻게 볼 것인가?: 한국 외교에 대한 함의」, 『주요국제문제분석』, 2021. 48, pp.1-27.

18) “지나친 혐중 정서는 위험하다”, 『한겨레』, 2022. 02. 15., https://www.hani.co.kr/arti/opinion/because/1031066.html?_ga=2.177856294.2035325351.1663919883-922004752.1663919883 [2022. 08. 30.]

19) “누가 중국의 문화공정을 부추겼나”, 『중앙일보』, 2022. 02. 08., <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25046309> [2022. 08. 30.]

20) “韩政客煽动反华情绪，中国驻韩使馆表态”，『环球时报』, 2022. 02. 09.,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6js0Kvy1Tx> [2022. 08.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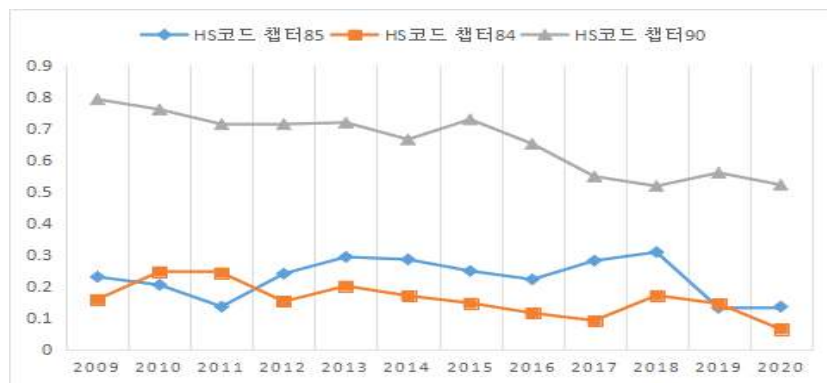
5. 中韩经贸发展为何不能有效拉动双边政治互信的改善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密切的经贸联系对双边的政治关系的发展有一定的增益效果，因此良好的经贸关系往往预示着政治互信存在改善的可能。²¹⁾在中韩建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诸多经贸关系拉动政治关系改善的案例。比如，密切的经贸联系增强了两国政府推动官方交流的意愿。再比如，中韩经贸合作的诸多议题增加了中韩高层外交的频次，从而增进了官方的交流。然而“萨德”入韩后中韩经贸的发展对政治互信的拉升作用却出现了钝化的迹象。那么“萨德”入韩以后，中韩经贸合作对政治互信增益效果为何减少了呢？

从数据上看，“萨德”入韩以后民间主导的贸易和投资规模依然在持续扩大。然而中韩产业的同质化现象却越来越显著，两国产业内竞争也开始日益激烈。²²⁾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制造2025”以来，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而韩国的出口竞争力整体下降。²³⁾从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对韩国出口的主要三大类（基于HS编码的分类）的贸易竞争指数看，韩国对华出口的主要三大类（HS编码第85章、84章和90章）的对华出口竞争指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图6）。特别是“萨德”入韩以来，中韩两国的产业竞争格局日益显著。与产业互补对政治互信的增益效果不同，产业竞争容易引发存量与增量利益的分配不均的现象，从而成为滋生经济泛安全化的土壤。

<图6> 2009~2020年韩国对华出口主要3个类目的贸易竞争指数

(单位: %)



*来源：经韩国关税厅数据整理后获得 <<https://unipass.customs.go.kr/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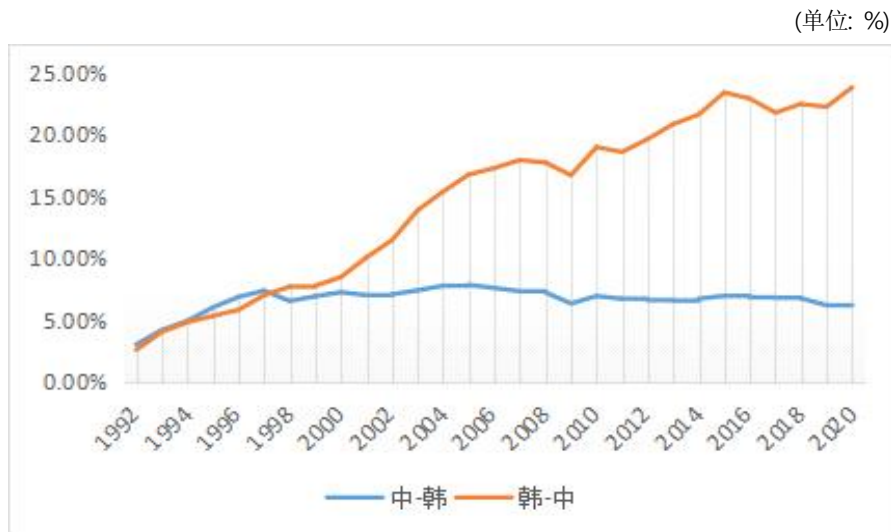
21) 朱勤军,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十大影响」, 『世界经济研究』, 2001. 05, pp. 72-75.

22) 이종찬, 「무역결합도(Intensity of Trade)를 활용한 제조업분야 한중 FTA 양허안 효과분석」, 『중국학』, 2016. 55, pp. 431-450.

23) 오래은, 이홍배, 「한중간수출경쟁력변화와구조적특징고찰」, 『중국지역연구』, 2022. 9(1), pp. 1-29.

此外，中韩贸易的非对称依赖的不断扩大催生了韩国对中国控制和影响韩国经济的担忧，进而引发了韩国社会各界关于经济安全的讨论。在建交初期中韩之间相互的贸易依存度大体维持均衡，然而随着中韩贸易的不断发展中韩贸易依存度的非对称特征也日益显著，截至2020年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达到了中国对韩贸易依存度的3.9倍（图7）。“萨德”入韩以后，韩国舆论进一步提升了经济安全意识。超过60%的韩国民众将中国视为经济“威胁”，²⁴⁾“经济属国”论也越来越多被提及。²⁵⁾

<图7> 1992-2020年中韩贸易依存度



*来源：依据历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及韩国关税厅<<https://unipass.customs.go.kr/ets/>>数据整理获得。

如果经济安全意识无节制地蔓延，经贸交流则容易成为涉及国家存亡的敏感议题，并上纲到了国家安全层面。在国安的名义下，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将变得更为合法，容易导致安全议题的扩大化和经济议题的政治化。²⁶⁾当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出现了过度的泛安全化倾向，则会导致国家之间的消极互动。比如，文在寅政府提出了“新南方”政策，谋求通过贸易多元化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避免重复“萨德”事件带来的损失。²⁷⁾尹锡悦政府则与美国共同设立了经济安全对话机制，以经济安全为纽带加强与美国经济安全

24) 项昊宇，“韩国对华政策切莫被“选举民粹”绑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2022.04.08.，http://www.ciis.org.cn/yjcg/sspl/202204/t20220408_8503.html [2022.09.03.]

25) 구기보, 「미중 무역전쟁과 한국의 대응」, 『성균차이나브리프』, 2018.6(4), pp. 161-162.

26) 张超、吴白乙, 「“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 『国际展望』, 2022.02, pp. 19-35, p. 149.

27) “中 의존 줄이고 교역 다변화...문 대통령 '新 남방정책' 발표”, 『SBS 뉴스』, 2017.11.09., https://news.sbs.co.kr/news/endPage.do?news_id=N1004477508&plink=COPYPASTE&cooper=SBSNEWS&WSND [2022.09.08.]

层面的政策协调,致力于构建技术同盟,加快了经济安保的战略布局。可以说“萨德”入韩后韩国政府提高了经贸领域对中国的安全防范意识,形成了牵制加防范中国的经贸政策取向,对华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色彩也愈发厚重,最终导致了官方交流的消极互动。随着中韩经贸合作升级为高级政治议题并泛化到国家安全领域,这不仅使中韩经贸合作无法有效促进政治互信的改善,还加深了两国之间的政治互疑。

6. 如何改善中韩政经关系不同步发展的现象

如上所述,“萨德”入韩后中韩政经关系出现的非同步改善的现象,那么针对这一现象可以通过何种途径改善呢?本文认为,针对当前中韩关系的现状政治主体可以适当做一些“加减法”。首先,“萨德”入韩后,中韩两国政府不断抬高国安议题,官方层面的交往实际上出现了泛安全化与泛政治化的倾向。针对泛政治化倾向,官方交流可以适当做一些“减法”,对国安议题进行理性的评估,防止政治议题过度泛化到非政治议题。其次,当前中韩之间的安全问题是结构性的,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仅仅通过官方交流改善中韩关系将是有限的,官方层面应该更加重视民间交流的作用,并在适当的时候为推动民间交流做一些“加法”。最后,民间交流主体应提高认知,优化思维方式,理性看待政治议题,避免受到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

首先,为了遏制泛政治化倾向,在官方交流过程中需要进行一些“减法”。国际交往中并非所有的领域都会涉及到政治,然而政治主体的思维定式与行为偏好却常常将非政治议题泛安全化,使得政治超出自身的界限,牵扯到非政治领域。如果将众多议题赋予政治涵义则会导致非政治议题受到政治思维的错误引导,形成了国际交往中的泛政治化现象。泛政治化倾向容易产生狭隘的政治认同,导致国家之间以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国际交往的依据,从而阻碍国家之间的交流,妨碍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萨德”入韩以后,中韩关系的许多议题被贴上了国家安全标签,致使政治层面的问题,不断外溢至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诸多议题,形成了泛政治化倾向。比如中韩经贸合作层面的议题并非政治问题,但是却被贴上了国安标签,上纲到了政治层面。经贸合作本身并不属于政治议题,政治主体的思维定式必然不利于经贸议题的解决,经贸层面的议题应该最大程度交于市场主导。将政治泛化到经贸议题不仅妨碍了中韩关系的正常发展,还可能损中韩关系的稳定,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新的瓶颈。因此官方层面应该适当做一下“减法”,避免政治过度牵扯到非政治议题,通过“有限政府”的思维转换实现“去政治化”从而回归理性的官方交流。

此外,官方层面还应尽可能减少对跨境人员往来的限制。自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政府被认为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两国间的民间交流。而当前韩国政府也出现了类似的倾向,这是值得反思的。比如,2023年中国放开了疫情管制后,韩国政府却对中国游客的入境采取“歧视性”措施²⁸⁾,考虑到仅有少数国家实行类似的措施,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政治意图。中韩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民间交流需求,只要在政府层面适度减少对民间交流的限制,就可以快速恢复到疫情前的交流水平。因此,在后疫情时代,政府应尽可能减少对跨国人员往来的介入和限制。活跃的民间交流不仅可以改善两国之间的民间情感,缓和民族主义情绪,还可以为重启因疫情停滞多年的高层外交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官方层面可以适当对民间交流做一些“加法”。建交后,中韩两国的交流往往由官方主导,官方主导的中韩关系也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比如官方主导了中韩建交、中韩FTA的缔结、疫情期间中韩“快捷通道”的开通等等。然而,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限制了官方在改善中韩关系中的作用,例如广受韩国舆论质疑的公共外交。为了改善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中国驻韩大使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与韩国民间团体及媒体展开了广泛交流。然而,韩国主流媒体站在政治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中国大使开展的公共外交进行了负面解读。甚至有媒体将中韩两国大使的公共外交活动进行对比,给中国的公共外交贴上政治标签,以迎合民族主义情绪,加深了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偏见和反感。²⁹⁾韩国社会似乎陷入了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无论中国政府如何展示诚意,韩国舆论均持负面态度。可见,当前官方主导的交流不仅成果有限,而且常常被民族主义者利用进行恶意炒作。因此,面对当下官方交流的困境,两国政府可以调整既往的战略思路,从台前转至幕后,重视民间交流的作用。

此外,“萨德”入韩后,中韩关系的发展越发受限于安保困境。政治主体的行为偏好和思维定式决定了中韩政治关系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也造成了官方主导的中韩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局限性,并逐渐成为了中韩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在改善中韩关系过程中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将会是非常有限的,需要广泛借助民间的力量。因此加强民间文化交流、积极推进民间跨文化理解是当前改善中韩关系的优先选项,也是改善中韩政治互信、推进中韩经贸合作和政治互信同步发展的持久有效的解决方法。为此,两国政府应积极为民间交流提供更多的制度便利和保障。比如,两国政府可以进一步推进通关便利化、简化通关程序、扩大免签范围,为跨境人员往来提供更为便利。针对

28) “日韩对华实施歧视性入境限制 中方反制措施来了”,《中国网》,2023.01.11., http://news.china.com.cn/2023-01/11/content_85054041.html [2023.01.15.]

29) “싱하이밍 대사 79명 만날 때 장하성 대사는 왜 1명인가”,《중앙일보》,2020.09.02., <http://www.joongang.co.kr/article/23876471#home> [2022.09.08.]

代购、直播带货等新型跨国民间交流模式，政策上应该进行积极引导，使其在推动民间交流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后，除了政府的作为，还应该重视民间交流主体的作用。具体来说，民间交流主体应该提高认知水平，优化思维方式，避免受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一方面，民间交流主体需要理性看待政治议题，区分官方和民间交流。当前，许多民间交流主体混淆了官方和民间的概念，将官方矛盾泛化为民间矛盾，导致政治矛盾的扩大化。因此，民间交流主体应该理性看待政治冲突和矛盾，远离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此外，民间交流主体需要正确认识两国间的历史文化争议，避免过度泛化争端。中韩两国都是东亚历史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国，拥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因此一定程度的历史文化争议在所难免。然而，我们应优先讨论其传承与保护，而不应过度关注归属问题。过度关注归属问题只会导致无意义的争议，最终伤害两国人民的感情。因此，民间交流主体应该树立共享东亚历史文化的意识，重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共同向世界展示东亚璀璨的历史与文化。

总而言之，中韩两国在地缘上联系密切，相互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邻国，因此良好的中韩关系对于两国的生存与发展都至关重要。在推动中韩政经关系协调发展的实践中，除了依靠官方力量外，还需要结合民间力量，实现官方机制和民间机制的良性互动。长远来看，中韩关系的推动模式应该是官方与民间交流的相互融合与相互协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韩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论文〉

- 구기보, 「미중 무역전쟁과 한국의 대응」, 『성균차이나브리프』, 제6권 제4호, 2018.
- 김진호, 「동아시아 국제관계 속 한중관계의 변화와 동북아 평화」, 『평화학연구』, 제19권 제1호, 2018.
- 김한권, 「한중 외교관계 30년: 회고와 전망」, 『국제지역연구』, 제31권 제2호, 2022.
- 박희락, 「한중 “전략적 협력 동반자관계” 의 기대와 현실 간 격차 분석」, 『아시아연구』, 제23권 제4호, 2020.
- 신종호, 「한중관계 30년 평가와 한국 신정부의 대중국정책 전망」, 『국가전략』, 제28권 제2호, 2022.
- 오래은, 이홍배, 「한중간수출경쟁력변화와구조적특징고찰」, 『중국지역연구』, 제9권 제1호, 2022.
- 왕샤오커, 「“사드” 문제와 한중관계의 구조적 문제점」, 『북한학연구』, 제13권 제2호, 2017.
- 이기현, 「한중관계 30년 평가와 미래발전에 대한 소고 - 구동존이를 넘어 화이부동으로」, 『

- 한중사회과학연구』, 제20권 제3호, 2022.
- 이남주, 「문재인 정부 시기 한중 관계 평가: 전략적 협력동반자 관계는 지속 가능한가?」, 『동향과 전망』, 제112호, 2021.
- 이장원, 「시진핑 시대의 한중관계: 사드 위기의 본질과 과제」, 『現代中國研究』, 제19권 제3호, 2017.
- 이종찬, 「무역결합도(Intensity of Trade)를 활용한 제조업분야 한중 FTA 양허안 효과분석」, 『중국학』, 제55호, 2016.
- 정중호, 「한중관계와 사회문화 교류: 인적 이동과 문화콘텐츠의 확산을 중심으로」, 『국제지역연구』, 제31권 제3호, 2022.
- 최재덕, 「한중관계 미래 30년을 위한 발전적 대안 연구: 중국의 공세적 외교와 호주에 대한 경제보복 사례를 중심으로」, 『평화학연구』, 제22권 제3호, 2021.
- 표나리, 「반중 정서를 어떻게 볼 것인가?: 한국 외교에 대한 함의」, 『주요국제문제분석』, 제48호, 2021.
- 황재호, 「수교 이후 한중관계의 평가와 신형관계(新型關係)를 위한 정책제언」, 『아시아문화연구』, 제53호, 2020.
- KITA Market Report, 「중국 코로나-19 방역정책 관련 주중 한국기업 경영환경 조사」, 2022.
- 白永瑞, 「中韩建交25年是成功的吗?—从历史的角度看中韩建交25周年的成果与课题」,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1(02)期.
- 毕颖达, 「萨德阴影下的中韩关系」, 『当代韩国』, 2017年第04期.
- 毕颖达、许焕美, 「“新国际秩序”构建下的中韩关系:挑战与期待」, 『当代韩国』, 2022年第02期.
- 陈向阳, 「中韩建交30周年:务实性合作与结构性矛盾」, 『现代国际关系』, 2022年第04期.
- 黄河、周 骁, 「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39(01)期.
- 姜龙范, 「后疫情时代中韩关系发展中的美国因素分析」, 『东疆学刊』, 2022年第39(01)期.
- 金永皓、田德荣, 「文在寅政府外交的“模糊性战略”:动因、内涵及影响因素」, 『当代韩国』, 2021年第02期.
- 李春福, 「建交三十周年的中韩关系:成果、机遇与挑战」, 『东北亚学刊』, 2022年第01期.
- 李 冰, 「中韩关系经历三十年发展仍将行稳致远」,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55(01)期.
- 李少军, 「正确处理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 『瞭望新闻周刊』, 2005年第14期.
- 李宗勋, 「中韩建交25周年与新型互信关系的构建—以历史文化交流为中心」, 『当代韩国』, 2018年第01期.
- 梁亚滨, 「中韩建交30年:现状、问题与未来」,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2年第02期.
- 刘利乐, 「论“萨德入韩”的非正义性及其矫正」, 『城市学刊』, 2020年第41(02)期.
- 刘晓宁、陈晓倩, 「中韩经贸合作30年:特征事实、机遇挑战与策略选择」, 『国际贸易』, 2022年第12期.
- 门洪华、刘笑阳, 「中韩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及其战略应对」, 『东北亚论坛』, 2017年第26(04)期.
- 沈铭辉、胡艺, 「中韩贸易25年:转折点或新起点?」, 『东北亚论坛』, 2017年第26(05)期.

- 王俊生, 「建交以来的中韩关系:动力、机遇与挑战」, 『云梦学刊』, 2019年第40(05)期。
- 王箫轲, 「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机遇和挑战」, 『当代韩国』, 2018年第02期。
- 王箫轲, 「文在寅政府的“两轴外交”评析」, 『当代韩国』, 2019年第01期。
- 赵立新, 「中韩关系: 能否迎来“第二个春天”?」,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53(02)期。
- 张 超、吴白乙, 「“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 『国际展望』, 2022年第02期。
- 张清敏、刘 兵, 「首脑出访与中国外交」, 『国际政治研究』, 2008年第02期。
- 张 爽, 「中韩经贸关系30年:成就、挑战与展望」, 『东北亚经济研究』, 2022年第6(05)期。
- 张茜喆、梁亚滨, 「中韩关系症结和应对」,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17年第04期。
- 朱勤军,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十大影响」, 『世界经济研究』, 2001年第05期。
- PAN BINBIN, 「The Value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iplomatic Rhetoric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 An Example of Chinese Diplomatic Rhetoric Toward South Korea」, 『아시아연구』, 2022. Vol. 25 No. 4.

<其它资料>

- “누가 중국의 문화공정을 부추겼나”, 『중앙일보』, 2022. 02. 08., <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25046309> [2022. 08. 30.]
- “中 의존 줄이고 교역 다변화...문 대통령 '新 남방정책' 발표”, 『SBS 뉴스』, 2017. 11. 09., https://news.sbs.co.kr/news/endPage.do?news_id=N1004477508&plink=COPYPASTE&cooper=SBSNEWSEND [2022. 09. 08.]
- “중국 ‘보따리상 BJ’ 600팀 생중계에... 동대문이 살아난다”, 『조선일보』, 2019. 01. 08., http://www.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9/01/08/2019010800166.html [2022. 07. 22.]
- “싱하이밍 대사 79명 만날 때 장하성 대사는 왜 1명인가”, 『중앙일보』, 2020. 09. 02., <http://www.joongang.co.kr/article/23876471#home> [2022. 09. 08.]
- “중국인 보따리상 '다이궁' 파워”, 『조선일보』, 2017. 08. 25., https://biz.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7/08/24/2017082403053.html#csidxb26434be106b7a09f7e65d1343ba108 [2022. 08. 15.]
- “지나친 협증 정서는 위험하다”, 『한겨레』, 2022. 02. 15., https://www.hani.co.kr/arti/opinion/because/1031066.html?_ga=2.177856294.2035325351.1663919883-922004752.1663919883 [2022. 08. 30.]
- “代购填补中国游客空缺 韩免税店业绩不减反增”, 『中央日报』, 2017. 05. 22., <https://chinese.join.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82719> [2022. 08. 15.]
- “韩国引入“萨德”严重破坏中韩互信合作”, 『新华社』, 2016. 08. 02.,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802/c1002-28604064.html> [2022. 08. 20.]
- “韩政客煽动反华情绪, 中国驻韩使馆表态”, 『环球时报』, 2022. 02. 09.,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6js0Kvy1Tx> [2022. 08. 31.]
- “李开盛: 部署“萨德”, 将损中韩关系底线”, 『环球网』, 2015. 02. 09.,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JHBKk> [2022. 08. 20.]

“日韩对华实施歧视性入境限制 中方反制措施来了”，『中国网』，2023.01.11.，http://news.china.com.cn/2023-01/11/content_85054041.html [2023.01.15.]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人民网』，2018.11.18.，<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406667> [2022.08.20.]

项昊宇，“韩国对华政策切莫被“选举民粹”绑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2022.04.08.，https://www.ciis.org.cn/yjcg/sspl/202204/t20220408_8503.html [2022.09.03.]

“中韩经贸合作“深”级潜力大”，『中国商务新闻网』，2022.06.08.，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rcep/rcepgfgd/202206/48719_1.html [2022.07.22.]

“中韩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展期”，『新华网』，2020.10.22.，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0/22/c_1126644210.htm [2022.07.22.]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사드 도입, 경제협력, 정치적 상호신뢰, 공식 교류, 민간 교류				
	영문	Introduction of THAA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olitical mutual trust, Official exchanges, Private exchanges				
<div>Analysis of the Unsynchronized Improvement of China-ROK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fter the THAAD Crisis</div> <div>Pan Bin-Bin</div> <div>The entry of THAAD into South Korea has had an impact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s well as politic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nd both have regressed to varying degrees. Since then, economic cooperation as well as political trust has been restored thanks to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two governments.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speed at which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improved, political trust has improved more slowl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fall under separate, autonomous domains that each have their own logic and rules of conduct. Specifically, market players dominat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while political players dominate political relations. The difference in behavioral preferences between market players and political players has resulted in the phenomenon that political-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ve not improved concurrently. Additionally, since politiciz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ties,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relations following the THAAD crisis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in fostering greater political mutual confidenc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currently plaguing China-South Korean relations can yet be resolved. First and foremost, in response to the trend towards politicization of official exchanges, the rational return of official exchange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depoliticization. Second, by encouraging private exchanges,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t sentiment can be slowed and public antagonism reduced, thereby rebuilding the public opinion base of China-South Korean relations.</div>						
저 자	반빈빈 / 潘彬彬 / Pan Bin-Bin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3.01.26.	심 사 일	2023.03.10.	게재확정일	2023.03.20.